



□卞文志

从皇家宫殿故宫博物院，到皇家园林颐和园，再到民间的亭台楼阁，这些规模宏大、保存完整的古建筑，引人驻足观赏的，除了层层叠叠的斗拱结构，还有色彩斑斓的彩画。11月16日，央视科教频道“人物故事”栏目聚焦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建筑油漆彩绘代表性传承人”李燕肇，当时他正忙着为中国园林博物馆内修缮双环亭彩画。“做这一行，也不是光靠喜欢就可以，要看自身条件是否足够，能不能持之以恒，耐得住寂寞。”

1982年，16岁的李燕肇初中毕业，机缘巧合之下，从小喜欢画画的他以学徒工的身份进入北京市园林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做学徒工的时候，李燕肇拜师冯庆生。冯庆生是彩画高级技师，擅长水墨山水，先后在颐和园、北海公园、香山公园、潭柘寺等多个皇家园林留下彩画作品。

“有些规律性的知识，师傅给你捅破了窗户纸，能少走很多弯路。当然，师傅教给你的东西，光听不行，还要多用心，多动手，多请教。”李燕肇回忆起自己的入门，都是从基本功练起，每天很单纯很枯燥。首先要了解彩画的常识，拿着师傅调好的颜料去上色，“这儿红那儿绿”，在李燕肇这行里叫“刷大色”。沥粉是进阶技艺，由于古建筑的构件凹凸不平，平时要在曲面上多练习，熟练以后才能上去沥粉。那时候学徒工们就拿着汽油桶、油漆桶，趁着别人休息时抓紧练习。平时除了跟着公司的师傅学技艺，李燕肇还在外面的书画学校学习国画山水、人物、花鸟。那段艰苦学习的岁月，让李燕肇拥有了扎实的国画基础，至今受益匪浅。

爱学习、爱琢磨的李燕肇在1988年成为了彩画班的班长。在网络不发达的时代，李燕肇经常通过各种方式搜罗、模仿古代彩画样式，他喜欢去琉璃厂和荣宝斋买一些书籍、画册，照着上面练习。一些古建筑上的彩画，李燕肇有机会也会去看，拍下来临摹。后来虽然能独当一面了，但在李燕肇看来，自己学生的身份从未改变。

“以前出师要求三年零一个节气，出师了就什么都学会了吗？并不是这样。”在纪录片里李燕肇感慨，北京地区的彩画以明清以来留下来的官式彩画为主，可全国有几十个省份，各地的民间彩画太多了。李燕肇曾去过山西、青海、甘肃等地的彩画，当地工匠师傅的智慧让他禁不住赞叹。

在古建筑修缮里，彩画作为装饰工艺，是最后一道工序，虽然在古建筑修缮里算是冷门，但却是古建的“脸面”“形象”。人家把木结构、门窗做好了，需要你去上妆。2004年故宫大修时，李燕肇担任彩画工长，负责故宫太和门东西庑房及周边建筑群的彩画修缮。要知道，作为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之一，故宫里的彩画品类是最多最全的，常见的和玺彩画、旋子彩画、苏式彩画、宝珠吉祥草彩画、海漫彩画五大类彩画，故宫都有。

在纪录片里我们看到，当时李燕肇修

复的龙草和玺彩画属于紫禁城里和玺彩画的一个类别。它的色彩为青、绿、红三色组合，龙画在绿地上，大草画在红地上，反差强烈。故宫的古建彩画，要求“原汁原味”，以“原工艺、原材料、原结构、原形制、最小扰动”为原则，尽量少动。之前修缮的时候，故宫彩画留了谱子，李燕肇就专门对“老谱子”做了整理与研究，确保纹饰和形制不走样。

古建筑彩画的一笔一画、一斑一点，体现的是主人的身份地位，文化内涵很丰富。李燕肇按照要求调制颜料，努力做到比例准确、统一，每道色都要做色标、色板。部分颜料本身有毒，他只能把颜料拿到单位调制，调制好再运到故宫。正因如此，颜料用量要严格控制，不能残留。此外，操作工艺也要严格把关，比如沥粉不流畅、高矮不平、断断续续，都要铲掉重新沥；刷色不均匀、颜色刷花了也不行。一些工人习惯了画清晚期的彩画，而清中期彩画细节不同，有时轻轻一笔，时代特征就变了，给后人留下的就是错误的历史信息。

文物修缮与简单的绘画不同，既不能对文物造成破坏，又要保证图案正确，尽可能保留原貌。为此，李燕肇认真研究修复的每个步骤，填充缺失的颜色时，更是多方查证核实，用吸尘器、羊毛刷、针管等繁杂的工具，对彩画进行除尘、软化、回贴、清洗和固定，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些珍贵的艺术品。最终，在李燕肇团队的努力下，他们修缮的故宫等古建筑以真容呈现在观众面前，得到专家认可，故宫修缮工程因此获评北京市建筑装饰优秀工程奖。

为达到尊重历史、修复原汁原味的要求，李燕肇及其团队对古建筑修缮要求严谨，而过程又很辛苦，他们经常要登梯攀高，站在架子上画画，时而站直，时而弓腰，工作入迷时，有时还会以一种十分扭曲的姿势画上几个小时，画完才发现腰酸背痛。尤其夏天，汗味混合着颜料的味，让人浑身难受。

40年的职业生涯中，李燕肇参加过地坛公园方泽轩宰牲亭彩画修缮，故宫太和门东西庑房及周边建筑群修缮，颐和园龙王庙、北海、香山等地的彩画修缮工作。在数得上名号的古建筑修缮施工现场，李燕肇都出现过。作为古建筑油漆彩绘传承人，李燕肇始终保持匠人的初心和热情，倾情守护着这项古老的技艺，用一支画笔、一盘颜料，让古建筑绽放了昔日的光彩。对古建筑修缮而言，修复与彩画这种传统手艺是要学习一辈子的，要干到老学到老，而且越干越觉得彩画博大精深。从托裱底纸、起扎谱子、调配颜料等准备工作，到沥粉、刷大色、抹小色、贴金……油漆彩绘的每一步工序，在40多年的修复与彩画工作中，早已深深地印在李燕肇的脑海里。

在纪录片里，李燕肇意味深长地说，古建筑修缮是一份寂寞的职业，我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因为彩画文化内涵很丰富，是很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十分乐意成为它的倾听者和传播者。在寂寞中坚守，在坚守中传承，让古建筑通过彩画技艺一直活着。

□雨林霖

每当考试季来临，紧张的备考环节中自然离不开教辅资料。在古代，有一种名为“选家”的职业教辅编辑，说得具体一些就叫作“时文选家”。

我国古代教辅市场最火热的时期大概是在明清。尤其明代中后期，科举考试日趋程式化，许多读书人不再专注于钻研经书大义，而是开始揣摩考试答题的技巧。加上活字印刷技术日渐成熟，出版行业非常兴盛，教辅也就成为一门大生意。

在众多教辅当中，卖得最火的是“时文选本”。明清科举考试采用八股取士，所谓“时文”，即科举考场中的应试文章。“时文选本”，类似于现在的“高考优秀作文选集”。早在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就出现了大量时文选本，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京华日抄》。此书由成化年间杭州通判沈澄，编选部分进士在科举当年所作的文章成册，并印刷出版。

此书一面世，大受士子欢迎，掀起一股购买热潮，同类书籍也随之跟风大量涌现。到了明朝中后期，“教辅热”愈演愈烈。晚明学者黄宗羲在《明文海》中引用嘉靖年间李濂在《纸说》里的话：“比岁以来，书坊非举业不刊，市肆非举业不售，士子非举业不览。”当时的书坊，若非科举图书基本不刊刻，书店基本上也只卖教辅，考生们也只看教辅。

时文选本可以细分为不同类型。比如“程墨”，是指乡试、会试考官所写的范文或中举考生的文章，这类选本权威性大，最受考生追捧；其次是“房稿”，选用的都是新科进士平日所作八股文，因此也相当畅销；还有“行卷”，是乡试中举举人的作品选，销量相对来说要差一些。此外，还有“社稿”“朱卷”“窗稿”“名稿”等，但权威性都不如前三种选本。

后来，出版商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编选。为了增强产品竞争力、抢占更多市场份额，出版商纷纷邀请一些著名文人和进士参与教辅的编撰，并对文章进行点评分析。这类人被称为选家，主要工作就是将科举考场上具有学习和参考价值的八股文编辑成册，再加以注解、诠释，最后集成出版，让当时的读书人学习、参考。

由于教辅出版商太多，行业也“卷”了起来。艾南英是晚明知名的时文选家，他在天启年间中举人，后来在科考中写的策文讥讽了当时的权宦魏忠贤，被停考三科。由此，他十分厌恶科举考场上的那些形式僵化、陈腐劣质的八股文，主张“以古文为时文”，并寻求从唐宋古文中寻找改良时文的方法。由于名气大，他编选的教辅一度在晚明教辅市场占据着统治地位。

要编选这么多教辅，艾南英自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有着自己的专业团队——豫

章社。教辅市场是一块大蛋糕，大家都想分一杯羹。后来，江南的周钟、张溥、张采等人也创建了编选教辅的团队——应社。应社的教辅和豫章社的不一样，他们的教辅充分迎合了当时的应试需求，贴近考官评卷标准，因而取得成功，很快成为艾南英最大的竞争对手。应社也由最初十一人的小社团发展成为大团队。崇祯初年，张溥等人又以应社为基础，合并其他文社，成立了复社。

晚明的时文选刊往往与文社利益联系在一起，学子们也往往结成文社或参加文社，并以文社的名义来标榜自己。此外，受晚明政坛激烈党争的影响，当时的文社也将选文当作拉拢社员、扩大社团影响力的重要手段。比如复社，便通过掌握八股选文标准，从而控制天下文风，进而影响政坛。很快，复社教辅在市场上的风头便压过了艾南英编选的教辅。为此，双方还曾一度爆发过一系列的市场争端。

复社的张自烈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他曾编选过一部《国朝今文辩》，将诸家的时文选本重新进行删评。艾南英发现张自烈编选教辅中很大一部分内容与自己编选的《今文定》《今文待》里的内容高度重合，于是认为张自烈所出的教辅是翻版，是抄袭盗版，与之开始了一段近十年的论战。但由于崇祯年间复社影响力非常大，尽管争论未分胜负，可复社出版的教辅逐渐成为教辅市场的主流。

其实，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中便为我们生动刻画了“时文选家”的生活图景。书中提到的萧金铉、诸葛天申、季恬逸、匡超人、马纯上、蘧公孙等人，都是书里有名的时文选家。其中马静学纯上，俗称马二先生，因屡试不举，最后在嘉兴的文海楼书坊以编选八股文选集为生。他编选的《三科程墨持运》，不仅具有权威性，而且还有详细的注解和批语，成为畅销大江南北的优秀科考教材。同行卫体善和随岑庵却颇为眼红，于是背地里评价马二先生：“听见他杂览倒是好的，干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乱闹，好墨卷也被他批坏了！所以我看见他的选本，叫子弟把他的批语涂掉了。”而另外一名选家匡超人，是个不学无术的学术混子，他甚至还在众人面前自吹：“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惟有小弟的选本，外国都有的！”读者读来真是忍俊不禁。

明末清初的学者吕留良也做过科考教材的生意。清人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记载：“本朝时文选家，惟天盖楼本子风行海内，远而且久。”“天盖楼”正是吕留良所经营的刻局，他靠着卖应试教材的生意大发其财。然而，当时的黄宗羲和万斯同对吕留良的这种行为颇为看轻，甚至调侃这是“纸尾之学”。看来，对不重教材只重应试教辅的行为和风气，在古代也是颇有争议的。

【短史记】

选家，古代的职业教辅编辑

【文化人物】

李燕肇：坚守技艺为古建筑披彩衣